

数字技术资本化与劳动新异化

肖 峰

【内容提要】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通过使劳动力成为数字化商品、使直接劳动对象非物质化、劳动资料智能化而实现了对劳动方式的系统性重构。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催生出不同类型的数字劳动，而数字技术的资本化则导致劳动的新异化或新型的异化劳动，具体表现为数字化平台技术的资本化与“售卖性情感劳动”、数字化生产系统的资本化与“主动性受迫劳动”、数字化传播技术的资本化与“消费性免费劳动”、数字化监控技术的资本化与“全景式透明劳动”。这些劳动新异化的根源在于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而消除新异化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让其回归作为劳动工具的本质，成为服务于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手段。

【关键词】 数字技术 劳动新异化 资本逻辑 剥削 技术应用

作者简介：肖峰（1956-），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哲学与科技高等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44）。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思想指明了异化劳动的四个方面：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过程同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同人相异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使用机器技术过程中所形成的异化劳动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认为机器作为技术手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应用导致了劳动异化：“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①当然，马克思对使用机器技术的劳动异化之批判并不是要否定技术本身，而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应用的批判，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与批判。

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工人除了将自身的劳动力出卖给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资本家以获得维持生存和再生产的生活资料以外，几乎别无选择，这种被迫异化的现实在传统物质生产方式中不可避免，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表现为出售工人生产的商品而以少量工资的形式对商品的部分价值进行回报和补偿，其支付额仅能维持工人“牲畜般的存在状态”^②。到了数字资本主义时期，脑力性的数字劳动取代体力劳动成为主要劳动方式，非物质生产成为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使发达国家的工人从被剥夺生存需求的绝对贫困中解放出来。工人在社交网络平台上的价值创造活动不同于以往工厂内的强制性被迫劳动，他们通常是自愿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由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异化在劳动过程中的消除。相反，数字技术的资本化使数字经济的盈利能力和经济效益与异化和剥削的程度直接挂钩：对用户生成的数据信息掌握和利用得越多，创造的价值收益就越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5页。

不仅如此，人们生活中的一切活动似乎都具有了生产性质，连人的消费行为也变为生产行为，劳动甚至成为一种“自发”的“上瘾”的活动，衍化出情感劳动、消费劳动等新型异化劳动。工人（主要是社交网络平台用户）创造的价值通常只得到极少的补偿，甚至没有任何回报，使剥削程度趋向无穷大。这种数字技术与资本相融合的新型的数字化生产控制方式，倾向于“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①，使劳动无时无刻不在受资本的吮吸。在产消一体、免费社交媒体、“玩劳动”的出现以及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涌现出的许多其他经验现实下，对数字资本主义中数字技术的资本化引发的劳动新异化进行分析，有助于认清其中的剥削实质，并找到消除劳动新异化的根本途径，这就是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

一、数字资本主义中的数字技术及其资本化

早在1993年，《福布斯》杂志上就刊登了一篇名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文章，伦茨纳和休斯莱因在文中提及期货、期权等计算机化的金融工具，用来描述数字技术在金融资本主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真正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深入批判性研究的是丹·席勒，他明确提出“数字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用来描述互联网在资本主义实现全球市场扩张中的重要地位，即认为正是数字化的网络扩大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与文化的范围，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所以称这样的时代为数字资本主义。他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互联网的全球市场扩张所带来的影响，认为即使在数字世界，资本仍然是政治经济的中心，互联网只是实现经济用途的一种新技术，互联网的发展及扩张受经济逻辑限制。随后，在2014年出版的《数字萧条：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一书中，他对先前提出的数字资本主义概念进行修正，认为数字是一种被人有意识地使用的工具，而不是最初的驱动力，并阐明了“旧”工业资本主义的强大行动者如何使用数字选项来实现和塑造一种新形式的资本主义，阐述了以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为标志的数字技术在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中扮演的核心角色，表明全球资本主义正进入一种新形式或新阶段，即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内外学者关于这一术语的定义，虽有不同的具体概述，但其共同点是都关注到了数字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例如，将数字资本主义理解为以“数字”和“平台”为支点来获取利润的资本主义最新表现形式^②，将其理解为在数字技术支撑下衍生出的资本主义新形态^③，将数字资本主义理解为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催生出的一种新型的自动化、非物质生产方式^④，或一种由数据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商业模式。由此可见，大部分学者都十分重视数字技术的重要作用，并将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来加以探讨。

数字技术是基于数字化的电子计算机所控制的技术系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并向数字技术系统的介入，数字技术走向了智能化的新阶段，由智能化数字技术掀起了一场关涉生产、生活等领域的全面变革，其力度、广度和深度完全可与工业革命带来的历史性巨变相媲美，关于技术社会的讨论也因此被置于新的数字化图景中，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的数字化也成为当今社会的新的技术特征，而本文所称的“数字技术”也特指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最新数字技术。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9页。

② 参见付文军：《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江汉论坛》2021年第8期。

③ 参见曲佳宝：《数字资本主义视阈下劳动力再生产的新变化及其矛盾》，《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12期。

④ Michael Betancourt, *The Critique of Digital Capitalism: 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gital Culture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Punctum Books, 2015, p. 75.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机器是分析技术现象最典型的代表，也是异化劳动形成的物质载体。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在资本增殖逻辑的支配下，资本家将机器引入生产过程，试图通过机器“缩短工人为生产其工资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延长他无偿地为资本劳动的工作日部分”^①，即无偿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如果说机器是对人的肢体器官的模拟，那么人工智能则可实现对人的心灵的模拟和替代，是更高级更智能的机器。因此，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的数字技术不是什么脱离了人类主体的神秘东西，其实质是更高级、更智能、更先进的机器手段，机器对人的劳动的剥削和异化在数字技术盛行下并未消失。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数字技术造成的劳动新异化不过是更高级技术对人的劳动异化的延展。

数字技术可以有不同的分类，从而数字技术资本化造成的劳动新异化也就有不同的呈现。本文主要从数字平台技术、数字生产技术、数字传播技术和数字监控技术四种类型数字技术的资本化来分析劳动的新异化。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看到，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的数字技术依然遵循资本逻辑，资本家对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技术的革新不过是为了谋求更多剩余价值、促进资本积累以及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而采取的一种技术化手段。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机器对劳动的异化，以新的表现形式呈现为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技术对劳动的新异化。

二、数字技术资本化对劳动方式的系统性重构

数字技术对劳动方式的系统性重构是数字技术资本化引发劳动新异化的前提，因此，要探索数字技术资本化带来了哪些劳动新异化，有必要对这一前提作出先行的分析。马克思将“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②视为劳动过程的基本构成要素，数字技术通过对劳动过程的赋能使劳动力成为数字化商品，使直接劳动对象非物质化，使劳动资料智能化，从而实现了对劳动方式的系统性重构。

1. 劳动者及其劳动力成为数字化商品

早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家就发现市场上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商品，通过使用这种商品就能够创造价值，这种特殊的商品就是劳动力，使用劳动力就能进行劳动，进而生产产品创造价值。对此，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过程描述为“资本家消耗劳动力的过程”。机器是劳动者借以实现自身劳动力对象化“为他人所有的产品”^③的工具，机器使“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④。如果说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机器主要是使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商品化，那么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技术则是使劳动力在消费活动中再度商品化；如果说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机器主要使劳动力对象化为实物形态的商品，那么智能化数字技术作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更高级的机器，则是使劳动力对象化为可量化的数字化商品，这是数字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相比较的特殊之处。当劳动力的出卖者本身（即劳动者）也被建构为可量化和出卖的数字化商品时，劳动力与劳动产品间的分离就更为加深。以数字平台为例，一方面，用户在使用这些由资本家控制的数字平台的同时，实际上被平台所有者当作数字商品出售给了广告商；另一方面，资本家通过本是由用户自身生产的数据信息有针对性地生产出能满足不同客户需求的商品，再通过精准营销策略出售给用户。在这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5页。

系列过程中，资本家将用户的交流及社交能力异化为可量化的资源或商品，用户自身及其生产的数据也被双重商品化^①。马克思曾批评资本主义工厂中使用机器的劳动“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怒斥其“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将工人培植为只有片面技巧的“畸形物”^②。到了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技术的资本化更是将这种畸形升级和扩大化，将原本可供劳动者在劳动时间以外自由支配的身体，在算法的组织和控制下异化为可操纵的外表，将人自身异化为数字化生产活动的一环。

2. 直接劳动对象的非物化

马克思曾经分析了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实体性物质存在的自然资源作为劳动对象与现实劳动主体之间存在着异化的关系。到了数字资本主义阶段，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化数字技术对劳动主体对象性活动的拓宽和延展，或许将使这种异化关系延伸为非物质化的虚拟劳动对象与虚拟主体之间的异化关系。各种高精尖技术、知识、信息、数据资源逐渐取代工业革命时期的土地、厂房等传统生产要素，跃升为商品价值创造和生产活动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使劳动的直接对象逐步从物质资源嬗变为非物质化的信息资料。特别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变革，催生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即数字经济，它依托于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通过分析、处理和使用海量数据信息等手段为各行各业赋能，促使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数据、知识、信息等资源作为数字经济最为核心的生产要素和直接劳动对象，以其全局性和总体性特征在推动社会经济进步和社会财富创造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必须明确的是，无论是土地、矿藏等天然劳动对象，还是数据、知识、信息等经由人类劳动过滤和加工过的劳动对象，都是生产劳动过程中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知识、信息这些极具现代性特征的生产要素对土地、厂房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替代并不是完全的，相反，智能时代下的生产活动往往是通过这两类生产要素的结合形成最优方案，通过它们的多元化协同发挥作用，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跃升式发展。

3. 部分劳动资料的智能化

劳动资料智能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劳动工具的智能化。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升级优化和智能改造下，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传统的劳动工具逐步由替代局部人力的机械动力机器扩展为具有人的总体性特征的智能化控制系统，变得更加智能化和信息化。劳动工具是承载着劳动者活动目的并被用于劳动对象之上的传导物，它是连接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使劳动者将劳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之上的中介，也是实体性劳动手段的一种。劳动手段在远古采集时期通常是自己的身体器官，而随着劳动对象的不断丰富及劳动过程的发展进步，劳动手段日益复杂，逐渐发展为可延长劳动者身体和思维活动的各类工具。劳动手段经历了从手工劳动工具到机械劳动工具再到智能劳动工具的演变，这一演变历程也显示了劳动手段由最初的人的身体器官，到作为人的肢体器官的延展，再到人的智力活动的模拟而不断深化的过程。马克思将使用何种劳动手段作为划分各个经济时期的标准，指出先进的劳动手段“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③。如今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由智能化控制系统所衍生出的各种智能劳动手段，比机械动力性的劳动手段往往更能体现当下社会生产的决定性特征。

① Christian Fuchs,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ransnational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Rethinking Marxism*, Vol. 21, No. 3, 2009.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0页。

三、数字技术资本化导致的劳动新异化

数字技术资本化引发的劳动新异化是数字技术在资本逻辑操纵下对劳动异化的延伸，具体而言，数字化平台技术、数字化生产技术（智能化生产系统）、数字化传播技术、数字化监控技术的资本化分别引发“售卖性情感劳动”“主动性受迫劳动”“消费性免费劳动”“全景性透明劳动”四种新型的异化劳动，并呈现出不同的异化特征。

1. 数字平台技术的资本化与“售卖性情感劳动”

关于数字平台的资本化，博亚季耶夫和梅扎德拉认为，平台的运作与当代资本主义结构具有深层关联，平台是由保值和资本积累的逻辑所驱动的，它是资本为实现增殖而不断寻找新的利润获取渠道、新的利润开辟市场、新的商品以及新的剥削方式的技术载体和手段^①。兰利和雷申认为，平台最初兴起的意义在于拓展互联网的联网能力，协调多变市场交易的中介功能，在平台资本主义中，平台所有者通过对平台用户生成数据的占有和提取，获得生产剩余价值的源泉，实现对平台劳动力的剥削^②。可见，各个学者对数字平台资本化的理解虽存在差异，但其共同点在于都将平台视为资本积累进程中的中介或工具。换言之，平台所有者对用户生成数据的提取实际上是平台资本主义实现资本积累和生产剩余价值的起点，即平台的资本化是平台所有者获取利润的新手段。在资本化的数字平台中，平台所有者对平台劳动力的剥削不仅体现在对其生成的数据信息的无偿占有和使用上，还体现在对其感觉、情感等感性认知活动的控制和利用之中。

数字平台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由象征和符号所建构起来的虚拟空间，在数字平台虚拟空间中，智能化数字技术通过对人类意识的摹写和对现实世界的刻画，使人类可以进入其建构的超现实（hyper-reality）景观中，并从中获得身临其境的感觉。在这一匿名、无界限、通过编程可操作的虚拟世界中，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作为一种新的劳动方式逐渐崛起并风靡全社会。情感劳动概念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对霍赫希尔德提出的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一词的同义理解。霍赫希尔德曾将情绪劳动表述为处于社会中的个体通过调整自身的面部表情，以表演的形式向公众展示经过自我管理的、符合公众期望的情绪这一过程，并指出其目的在于出售情绪劳动以获取工资，以此获得交换价值^③。在数字经济平台盛行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物质条件不断被数字信息所增强，即不断被数字信息所编码或叠加，连现实的感性的生命个体也被编码和符号化，抽象为可拥有多重角色的数字身份。数字身份的获得，使人类的数字情感表达具有了载体，拥有数字身份的个体在数字平台上不仅从事生产数据信息等原料的数字劳动，也从事着情感劳动。

数字平台技术的资本化使个体情感的私人属性被资本家异化为用于售卖以获取商业利益的商品，即平台劳动者的情感也被资本化。以如今风靡全球的网络直播平台为例，直播平台中互动的主播和粉丝在资本家建构的虚拟空间中双双进行着情感劳动。一方面，主播通过隐藏自身真实情感，在公众需求和喜好的引导下创造出—个可供展示的外在表情，并以此获得粉丝打赏和平台工资；另一方面，粉丝在消费主播的情感劳动时，在与主播的互动交流中自愿而又主动地为平台所有者创造着数

① Manuela Bojadžijev and Isabelle SaintSaëns, “Borders, Citizenship, War, Class: A Discussion with Étienne Balibar and Sandro Mezzadra”, *New Formations*, Vol. 58, No. 21, 2006.

② Paul Langley and Andrew Leyshon, “Platform Capitalism: The Intermediation and Capitalization of Digital Economic Circulation”, *Finance and Society*, Vol. 2, No. 1, 2016.

③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 7.

据流量。按照霍赫希尔德的说法，网络主播在资本的诱惑下将自己的身体打造为可供大众消费的虚拟化商品，通过数字平台这一中介，以表演这一虚拟化商品表现形式将自身售卖给大众。这种将自身及自身的劳动力数字化为可计量的虚拟商品而出卖和共享给大众的行为，是一种为了获得金钱而“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①的行为，无疑体现了数字化时代在资本逻辑支配下人类主体最大程度的异化。如果说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造成的是身体和体力劳动的分离，那么在数字技术资本化的数字资本主义时期，则是真实情感与情感劳动的分离。数字化平台及平台用户生产数据的私人占有属性，使用户在数字身份中建构的虚拟情感愈加与自身真实的情感相疏离和错位，甚至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引导下将自身情感打造为可出售的商品，通过交换实现对金钱的追求，使“售卖性情感劳动”这种新型异化劳动形式逐渐形成。

情感劳动的异化，一定程度上源于虚拟空间中数字身份主体的虚假情感需求和欲望。虚拟空间的假想性极易让人深陷和沉迷其中，使现实主体逐渐丧失本真及真实的社会交往和情感交流。在挣脱了时空束缚、摆脱了制度规约和拥有更大自由的虚拟世界中，现实世界的道德约束和伦理谴责被陷入幻想世界中的心理意愿撇在一边，金钱、权力、力比多等成为人际交往的快乐原则。这种看似扩大和更新了的社会交往，实则瓦解了现实社会中共同体和个体之间的真实关系，抽离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公共纬度，成为了所谓的去社会化（de-socialization）现象。并且，过度沉迷于虚拟世界，为适应虚拟世界中多种角色而扮演的多重自我，还会逐步瓦解现实生活中真实、完整、统一的“自我”，“一个统一完整的人格也将随之解体”^②。这种虚拟共同体也曾经承载着不少学者对未来社会乌托邦式的展望，他们寄希望于通过这种电子媒介式的新型社会摆脱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唤醒无产阶级意识，但在资本逻辑下成长和运作的数字平台虚拟空间，非但无法挣脱阶级意识的束缚，更使社会共同体这种意识和关系在隐匿化手段中被淡化和消解。

2. 数字生产系统的资本化与“主动性受迫劳动”

对利润的不懈追求和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纷纷将资本投入能够生产海量数据的智能化数字技术，不断将智能化生产系统引入生产过程，试图通过对资本有机构成比例的调整来实现对资本价值的无限追求。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在生产活动领域中的推广和普及，使得由智能化数字生产系统逐渐代替传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一般机器生产系统成为最新的固定资本，并在资本有机构成中的占比越来越大。数字化生产系统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固定资本，它还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手段促进了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在这种生产模式中，“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更多地取决于智能化生产系统的性能水准和运行状态。当数字化生产系统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生产过程时，催生出虚拟和实体生产体系灵活协作的新运营模式，智能工厂中产品生产的定制化及全面自动化，使“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③，劳动者在这样的生产环境和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的支配自身劳动力的主动性，是社会发展中个人进步的体现。

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增殖的本性将分工和机器不断引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原本能够使人挣脱繁重体力劳动进而实现自身自由与解放的机器手段，由于资本的私人占有属性，不断挤占劳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② [韩]金文朝、金钟吉：《数字技术与新社会秩序的形成》，柳京子、张海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5、196页。

者的生产空间，将人的存在贬低为一种功能性、职能性的存在，使人降格为机器的附属物，而机器则升级为支配人的工具。如果说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这种异化是由于人们受非自愿的固定化分工的约束而被动与自身的劳动行为相异化，那么在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资本主义阶段，这种异化已深度演化为人们在非自发的自由活动过程中与自身行为相异化；如果说过去工人受生存需要所迫从事的劳动是强迫性的，那么现在他们在智能化生产系统中从事的劳动在某种意义上则是主动性的，因为“只要工人的活动不是[资本的]需要所要求的，工人便成为多余的了”^①。为了避免被数字技术所替代而变得不被资本所需要，工人必须主动积极地去经受更大难度（包括更长工作时间）工作的“考验”，看似主动积极的背后，其实是避免被抛向失业大军的受迫。

劳动的主动性还表现在数字化生产系统对劳动者身份的转换，即从直接劳动的参与者转变为劳动过程的监督者，使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具有更多自主性，即一定意义上的主动性。但这种主动性背后仍然包含着多重的受迫性。如在以工资为驱动力的报酬机制下，为了获得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资料或是为进行再生产活动积累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大多数人主动延长自身工作时间，甚至不惜牺牲自身生命健康，用业余休闲时间来获得更多的工资收入。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为了提高工资他们往往过度劳动，甚至为了多挣几个钱“完全放弃一切自由，在挣钱欲望的驱使下从事奴隶劳动”^②。另外，虽然数字化生产系统在创造价值的规模和效率方面具有巨大优势，但其运转速率的提升以及单个劳动者操纵机器数量的增多也会造成工作强度的增加，并且它的高技能要求、高耗时性特征和高发散性特点同时导致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由高强度的体力消耗向高强度的精神压迫转化。在物质生产能力还不十分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劳动者往往通过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来换取自身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但在物质生产能力高度发达的数字技术时代，智能化生产系统解放了人的双手，脑力劳动逐渐替代体力劳动成为主要的劳动方式，劳动者必须通过高强度的脑力支出来维持自身的生存竞争力，才不至于在高度内卷化的世界中被淘汰。激烈的竞争和高强度的脑力消耗使其在精神上承受的压迫远高于体力消耗所付出的健康代价。例如，部分为获得高工资的白领阶层，主动承担着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和精神消耗，心脑血管疾病逐渐成为程序员等上班一族英年早逝的罪魁祸首，并逐渐呈现不断向低龄化人群靠近的趋势。人的生命在优越的生活与工作环境中悄然无声地被资本消耗殆尽，在智能化数字生产系统中看似主动的劳动，其背后是身不由己的受迫性。

从表面上看，人们在智能化生产系统中所从事的劳动与马克思描述的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工人所经历的悲惨劳动截然不同。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工人的身心损害来自生产过程中肉眼可见的劳动重负，劳动主体与自身类本质或社会关系的异化往往是因强制性压迫而形成，或是源于被动忍受糟糕恶劣的工作环境，被动遭受工厂主的无情打骂，被动从事“把生命耗尽的过度劳动”^③，等等。这样的劳动使工人感到不幸，肉体和精神都受到摧残，在劳动中感觉不自由不舒畅。因此，工人们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④。到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智能科技介导的生产力极大优化了生产系统，使工作环境和条件得到空前的改善，资本家提供的待遇也能使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基本保障。但无论是环境恶劣的工厂还是条件优渥的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在为资本增殖服务的条件下，它们都是资本剥削的场地。虽然两者在表现形式上有公开性和隐匿化的区别，但在这些场地所从事的劳动都具有受迫性，由于后者具有看似主动的表象，因此称之为“主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

性受迫劳动”。

3. 数字传播技术的资本化与“消费性免费劳动”

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的受众学派将受众定义为在媒体上观看商品广告的用户，并认为这些用户不仅是被媒体公司出售给广告商的商品，还是为媒体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力。他们将社交媒体视作生产场所，用受众劳动概念来分析受众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在媒介价值创造中发挥的作用，认为受众在消费媒体内容时，实则是被媒体公司作为商品售卖给了广告公司，他们因此将此过程定位为资本积累的一环，由此指向受众的被剥削问题^①。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的受众理论学派关注传播媒介的生产功能，将传播媒介视为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场域，将传统传播政治经济学把媒体仅仅视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场所的观点，修正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媒体所包含的新型生产关系，并将受众的价值创造纳入资本积累的链条，实现了对媒体研究从文化分析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转变。他们认为，数字化传播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运用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和过程起极大的促进作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化过程不断渗透到互联网媒介等数字化传播技术中，不断为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大再生产开辟新的路径。他们还认为，在资本主义媒介环境中，受众的观看行为（消费活动）属于一种工作形式，并且这种工作的过程与内容与受众相疏离，即是异化性的工作。在观看过程中，受众作为传播媒介的使用主体，成为媒介生产场域中的数据信息生产的实践者，成为进行价值创造的积极受众。就是说，互联网媒体用户在观看广告上的时间耗费以及随后购买广告消费品的消费行为中，即受众在文化知识消费的过程中产生了生产性活动。

可以说，互联网媒体上的观看行为是消费性的、满足人需求的一种休闲娱乐活动，是远离工作日的去异化的“自由时间”。与在工作日中无法决定自身的自由选择权相比，受众在媒体中的消费行为似乎使其能够掌握和控制观看的自由选择权，对自身行为的控制拥有更多自主性，意味着比在工作日中承受更少的异化。但当互联网媒体在资本逻辑的操纵下被异化为媒体提供者与媒体用户围绕时间展开的动态斗争场所后，劳动时间“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②，人们所受的剥削将更多更大，从固定工作时日延长到休闲娱乐之暇，从生产活动领域延伸至消费活动领域，固定工作时间被割裂分散为碎片化的片段，固定生产场地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则延伸至休闲娱乐场域的消费活动。灵活多变的劳动时间使资本家更易对劳动者实施弹性控制，而消费活动的生产化和劳动化则使资本家拓展了获得资本积累的新途径，并将剥削扩大化。

一方面，数字化传播技术在各类互联网媒体和数字平台上创造出“超真实”的图像景观，吸引人们的眼球和勾起人们的兴趣，使广大“低头一族”“手机一族”“游戏一族”在不受外界强力压迫之下，深陷于这些充满着现实时空景象的虚拟图像世界而无法自拔，被困困于由超真实景观世界所构筑起的“高墙”之中，被这些耗时机器所牵引和操控。按照受众商品理论学派的观点，这些受众花费在数字传播媒介上观看图像景观的时间越多，他们为资本家生产的数据信息也就越多，资本家通过售卖数据信息所获得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大，他们在休闲娱乐等消费时间免费为资本家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他们所遭受的剥削也就越大。另一方面，智能化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普及，特别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使用，使人们在刷视频、听音乐、浏览网页等休闲娱乐的消费活动中为资本家源源不断地提供着作为劳动对象的海量数据，并为资本家挖掘和利用数据，再生产出数据商品以剥削用户提供了机会空间。这也就意味着，人们用于休闲娱乐的消费活动时间，在数字技术和资本的

^① Eran Fisher, “How Less Alienation Creates More Exploitation? Audience Labour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TripleC (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Open Access Jo*, Vol. 10, No. 2, 2012.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6页。

“合谋”下，间接地成为不断免费为资本家即时提供海量数据等生产原料的剩余劳动时间。这也印证了马克思的话：“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①当然，这些休闲娱乐活动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是有条件的：一是人们的观看行为产生的数据必须被收集处理并对象化为资本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资料；二是人们观看的时间超过了制作节目所需费用的必要数量，即产生了“额外的观看时间”，并在这种多余的“额外观看时间”里创造了剩余价值。

各种数字化传播技术创造出缤纷多彩的消费景观，极大地助长和刺激了消费主义的兴起，人们在享受和消遣各种智能化数字技术带来的娱乐之时，实际已沦为平台资本主义生产数据和信息的免费劳动力和潜在后备军。那些身处各大数字平台的用户，在娱乐和消费活动中为平台所有者生产着海量数据，主动将网站浏览轨迹、评论聊天回复等信息资料提供给数字技术平台并不求报酬，虽然并不情愿，但也事实上成为了平台所有者的免费劳工，而这些获得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双重身份的平台用户类似于阿尔文·托夫勒口中的产消者（prosumers），他们既生产数据，又消费由自身生产的数据所创造出的产品（资本家针对用户数据所推出的广告等）。手机、电脑等互联网载体成为用户为资本家提供数据原料的具象化劳动对象，沙发、卧室、交通工具甚至是“马路牙子”也成为新的劳动场所。届时，生产性活动不仅存在于传统的生产过程中，一切生活和消费的休闲活动也因数字化而具有了生产性质，娱乐和工作的界限变得模糊，创造了生产商品与消费服务相结合的新型“消费性免费劳动”。通常劳动跟生产环节挂钩，压榨劳动力是存在于生产环节当中的，而如今数字传播技术的资本化更是将消费也拓展为生产环节，只要生产和消费存在，在以私有制为核心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压榨劳动力的现象就会依旧存在。

4. 数字监控技术的资本化与“全景性透明劳动”

从最初的社会管理工具，发展成资本主义进行霸权技术垄断的政治手段，再到如今对生产及消费领域的全景式监控，资本与监控技术的联合使资本对人的剥削变得无孔不入，并推动形成了监控资本主义的新型经济形态。2020年9月，美国上映的一部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向大众揭示了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是如何被人工智能等智能机器异化为资源的本质。异化的前提是通过各种引导来改变人的行为，而引导改变的前提是深度理解人的行为模式和动机。资本家通过数字平台等各种智能设备载体，对用户进行无处不在的数据采集和跟踪，通过海量数据的收集及算法技术的挖掘，达到对用户行为模式和思想动机的深度理解和精准预测。这种收集和跟踪用户一切行为的方式可以理解为互联网对人类的监视，而这种基于监视的商业模式就被称作“监控资本主义”。此类对社交网络用户的监控不同于国家权力机构对特殊人员的监控，其目的不是实现国家的政治控制，而是实现资本主义对信息商品化的需求。资本家通过对社交网络用户的监控，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创造一种自我推动的机制来创造交换价值，用一种封闭的传播和生产方式来建构一套专制的经济体系，从而更有效率地促进资本的积累。

如果说数字化传播技术使人的劳动时间资本化，将人的一切时间都变为资本增殖的来源，那么数字化监控技术则使人的活动空间资本化，将人的一切活动空间都置于避免不利于资本增殖的管控之中。互联网伦理学家特里斯坦认为，互联网跟以往没有目的性的工具不同，如今的互联网作为工具的阶段早已成为过去，来到了以致瘾和操纵为基础的技术环境。在互联网和宽带所及之处，摄像头、传感器等监控设备数量成指数级增长，这些数字化监控设备捕捉着广大受众在生产生活、休闲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9页。

娱乐中产生的一切数据痕迹，监视、调整甚至操纵着社会的正常运行轨迹，使身处于资本家布控的监控设备中的社会主体如同生活在“圆形监狱”之中。数字技术把人异化为资源的本质与资本主义是同构的，数字资本家通过对用户生产数据的强制掠夺（若不下载APP或登陆注册就无法观看相关内容等）和无偿占有（平台所有者无需对用户生产的数据提供报酬等），使用户自身的劳动成果异化为资本家用于获利和利用资本再生资本的工具。在这一过程中，社交网络用户自我表达和与他人的网络交往越多，资本家收集到的信息也就越准确，对其监控也就越精确，对其剩余价值的盘剥也就越多。资本家就这样用其新发明的生产控制方式，开辟新的商业机会和谋取高额商业利润，并且通过将整个社会空间置于其数字智能技术设备的监控之下，进一步实现了资本与政治的双重获利。

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工人由于受作为“半资产者”^①的监工的监视被迫在固定工作时间内从事有害身体健康的体力劳动。到了数字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对工人劳动的管控手段则由人工转变为智能化数字监控设备，并且将监控时间由固定生产劳动时间延伸至生活休闲时间，将监控范围从固定工作场所拓展至家居娱乐场地。由于数字化监控技术的资本化，遍布各处的智能监控设备，一方面充当着传统雇佣经济领域中的监工角色，对处于异化劳动中的劳动者进行实时监控，从上班的打卡报到和实时定位监视，到下班后智能手机的信息轰炸和时刻待命，使劳动者工作和生活时间被混淆和模糊。数字化监控产生的无形外在压力迫使劳动者精神高度紧张，在隐匿化的强制劳动中身心俱疲，如果有机会脱离这种外在的、强制的、被迫性的劳动环境，“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②。另一方面，占有核心技术手段的资本家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网络爬虫技术及智能算法等手段对互联网用户进行智能定位和行为追踪，从衣食住行等生活日常和爱情婚姻等家庭琐事，到政治经济等国家大事和文化教育等闲情雅致，数字化监控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全方位监控使人们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均被监控和操纵。在资本逻辑支配下，数字化监控设备将一切可控领域和范围都纳入窥视的界域，使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劳动者和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劳动者皆处于全方位的劳动控制模式中，并进一步形成“全景性透明劳动”这一类新型的异化劳动。

此外，数字平台作为一种新的沟通媒介形式，还使资本家的意识形态灌输变得更加便捷和隐匿。资本家美其名曰提供免费数字平台供用户娱乐、为用户服务，实质上是通过将其意识形态附着在信息文化产品之上，来悄无声息地灌输给平台用户，并试图通过这种“温和”的手段和方式构建其全球话语体系。对于资本家利用数字平台（包括各类网络媒体）来宣传和灌输其意识形态的手段，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对其颇有研究，前者认为资本家对意识形态的灌输是强制性的，后者认为媒体中的受众是意识形态建构的参与者，他们都将媒体视为资本家宣传意识形态和建构话语体系的工具。利用数字平台及各类媒体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行为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持续性，常常成为资本家实现经济和政治双赢的领地。

四、数字技术的回归及异化危机的化解

数字技术资本化造成的劳动新异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框架内无法消除。为了克服数字化的奴役劳动，必须质疑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展望数字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让数字技术回归到人的工具的本质，使其成为解放劳动者的新手段而不是资本逻辑下的异化新工具。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

工业革命时期，资本家通过有目的、大规模地将科技手段引入生产过程，使生产变成应用科技的过程。机器作为比先前手工工具更为复杂的生产手段，一经引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改变了人与生产工具的关系。机器作为一种复杂工具，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作用于劳动对象时所使用的辅助物，机器本身并不会导致“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却颠倒了机器和人的关系，将人异化为机器的附属物。基于机器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相似原理，对于数字技术造成的劳动或劳动主体的新异化问题也不能一概而论，同样要辩证地从其社会使用形式中去深入分析，即“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①。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核心的数字技术本身能够减轻人类劳动和丰富人类生活，能够快速提升整体经济效率和促进生产力的指数级增长，能够实现社会关系的重塑和社会结构的优化升级，如此等等。但资本主义应用却使数字技术所蕴含着的一切有利于人和社会发展的条件都走向反面。各种数字化智能机器不仅在生产过程中逐渐代替人的位置，将人驱逐出工作岗位，在生活中更是占据和控制着人的身体和心灵，撼动和威胁着人的主体性地位，导致时间异化、消费异化、情感异化等新异化的诞生，从而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工人的劳动手段愈先进，就愈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②。

但在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应用中，“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③。数字技术被用于劳动者为自己生产和创造财富，这一过程能够使人的本质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和丰富，并且数字技术所蕴含的巨大生产力由全体人民共享，数字技术资本化导致的“劳动的人脱离劳动工具的现象”^④也被消除。数字技术对生产社会化的进一步扩大，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中将成巨大优势，为促进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契机，甚至为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必要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创造相关的物质和精神条件。

当数字技术及其创造的智能化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时，人工智能将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一方面，这将带来经济效益的显著提升，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大数据、物联网等结合所形成的综合的数字技术的不断开发和应用，成为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的生机。另一方面，生产过程中各种智能化数字技术手段的广泛使用，使人类有充足的时间去追寻和从事教育、文化及科学等陶冶情操的、非物质资料生产的、带有服务性质的产业。回归了劳动工具本质的智能化数字技术在社会主义应用条件下将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进行重塑，各种极具颠覆性和创新性的变革手段使各行各业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创造出巨大的生产潜力。因此，要想摆脱数字技术资本化所带来的劳动新异化及其危机，唯一的出路是彻底变革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生产关系，让数字技术回归劳动者所有，实现劳动者驾驭数字技术、数字技术服务于全社会的合理关系，由此从根本上摆脱数字资本对数字技术的操纵，推动其由资本主义应用所引发的新型劳动异化，转向由社会主义应用所导向的劳动解放。

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就是要从根本上破除资本逻辑对数字技术的宰制，这是数字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数字信息资源所具有的“越共享价值越大”的本性，数字技术在本质上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更加契合，而数字技术及其信息资源的私有与垄断必然限制数字信息价值的社会实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6、4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1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页。

也必然制约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信息悖论就表明了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尖锐存在的事实。通过实现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可以使数字技术从作为资本增殖的唯利是图的工具，转变为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手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数字技术的开放共用，数字成果的共创共享，数字资源的社会价值可以得到最大化实现，公共利益的诉求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由此充分表明，数字技术的优势只能在社会主义的使用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当数字技术所创造的巨大智能生产力和精神文化成果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结合时，也为消解劳动的新异化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因为此时数字劳动及其成果不再由资本所独占，而是由全体劳动者所有；此时的数字技术使用就成为提高劳动积极性的手段，而非造成两极分化、挫伤劳动热情的根源；劳动者和数字技术之间不再是对立的异化关系，而是协调、融洽的关系。数字技术彻底为劳动者服务、以劳动者为本、促进劳动者的解放，使其走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由此，数字技术既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社会主义也为数字技术摆脱私有制的束缚提供了解放的机遇，制度优势与技术优势相得益彰，形成强大的互相促进的关系。

从具体技术来看，实现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还需要实现从数字平台技术到数字生产、传播和监控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数字平台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可以寻获经济发展的新战略，培育新兴商业模式和产业业态，促进数字经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平台经济的长足发展，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繁荣提供新的支撑；数字生产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可以系统地推动基于智能化生产工具条件下的自由劳动解放，促使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得到又一次质的提升，为社会主义走向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提供坚实保证；数字传播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可以提高公民的政治觉悟、道德水平和科学素养，助力人的精神层面的健康成长，同时还可以强力提升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舆论场中的话语权，破除资本主义国家的传播垄断和意识形态霸权，消解资本逻辑支配下利用技术优势来制造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和新冲突，扩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影响力；数字监控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可以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新手段，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向来实施对数字技术的算法审计，杜绝唯利是图的资本逻辑对算法的植入而导致的种种算法歧视、数字陷阱、网络沉溺、虚假信息消费诱惑等现象，使人的数字活动与行为不再沦为资本蚕食的对象，而是回归为丰富生活与健康发展的新手段，在此过程中，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无疑也成为提高国家治理水平的新工具。

参考文献：

- [1] 包大为：《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年第7期。
- [2] 潘冬冬、曾国权：《理解情绪劳动：从异化到治理术》，《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5期。
- [3] [美]丹·席勒：《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网络与尼克松时代》，翟秀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 [4]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 [5] Nick Srnicek, *Platform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编辑：黄华德)